

# 張君勳傳奇(上)

(本文插圖刊第2頁)

——組黨不是兒戲，是賭性命的事

## ●顧紹昌

### 寶山夫子秀才翰林

張嘉森先生，字君勳，一字士林，號立齋，外人以 Carsum Chang 稱之，清光緒十二年農曆十二月廿五日（一八八七年一月十八日）生於江蘇省嘉定縣，後遷居寶山縣真茹鎮，人稱寶山夫子。六歲入學讀書，善讀亦善嬉戲，每獨出心裁，有軍師之稱。十二歲奉母命入上海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習英文及數理化，館中授漢文，注意掌故輿地之學，對政治制度之興趣，實從此啓。翌年，戊戌政變，滿清政府通令逮捕康有為、梁啟超，館門前懸掛康、梁兩氏照片，先生印象尤為深刻，由而促其委身國事之始端。光緒廿八年，十七歲，詔廢八股，改試策論，是年遂應寶山縣鄉試，中秀才。及後，投考上海震旦學院，該院為馬相伯先生所創，所習主要科目為拉丁文學，馬相伯自任教授，一月之內讀文法一冊，內容茫然不知所云。又以學費過高，籌集不易，每學期需銀一百兩，無法繼續，半年之後，改入南京江南高等學校攻讀。入校甫一年，俄佔東三省，舉國激憤，鈕永建籌組義勇軍，倡議抗俄，先生

列名參加。校長認為係革命行爲，立被退學，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於是在國內求學時期即告結束。先生既遭退學，擬欲赴日本留學，以不獲父母同意未果。

得友人介紹前往長沙明德學校任課，以廣方言所學之英語授人，受教者多為三四十歲中年人，時黃興（克強）為齋務長，張溥泉（繼）教法國革命史，得緣相識。僅兩月又去禮州及常德兩中學，前後兩年，積有四百多元，於是到日本讀書。適寶山縣選派學生留日，先生應入高師理化部，而志在學習軍事或政治，為達成出洋，不得不姑應之。半年後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預科，因此官費告停，窮學生之生涯，自是始矣。

時值梁啟超自美返日，發起政聞社，先生相見後，即與之合作，嘗投稿於新民叢報及學報。先生之四弟公權（嘉墩），亦留學應慶大學。稿費所得，供兩人學費，然常囊空如洗。兄弟二人曾將整塊面巾，首一分為二，繼又二分為四用之，終至破爛不堪而後已。兩人既不同校，每星期聚晤一次，以六銅元之烤山芋為週末大餐，經濟雖窘，而手足之情益增。

先生留日期間，正是早稻田政經系的全盛時代，如蒲田合講政治學，逢春進五的國際法，久侯長雄的憲法，田中洗吉的財政學，都是非常精華的一羣。他遍讀威爾遜的「國家論」、蒲徠士的「美國共和政治論」、洛克的「政府二論」、彌爾的「代議政治論」、以及安森的「英國憲法及其慣例」等有關民主憲政的經典著作。先生在早大，也曾讀德文三年，習德文經濟學與憲法，日本學校雖讀英文參考書，但教授們經常提起德國的著名學者，因此在那時，先生已有去德國的念頭。

光緒卅三年，先生廿歲。是年政聞社派人返國，發起憲政運動，先生持梁啟超函見陳散原，適御史蔡京臺在座（即參康梁之人），陳散原懼之，立遣人購船票送先生經滬再返日本。宣統二年，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應學部試，以優等成績敘，翌年殿試，得授翰林院庶吉士，即所謂「洋翰林」。

### 民國議長歐洲觀戰

武昌起義後，先生返寶山，任縣議會議長。

無何，民國建立，南北議和。俄蒙協約，而蒙古獨立事起，俄先提四項要求，先生意以憑此四項與俄交涉，而袁世凱置之不理。及俄蒙條約成，袁氏始與交涉。其意四項交涉求俄讓步不遂，人將謂我喪權。而俄蒙條約達二十項之多，若得俄讓步數項，則國人將謂已盡其折衝之能事。先生聞袁世凱用心卑劣如此，乃於「少年中國」爲文攻擊，且數袁世凱十大罪狀，全國各地報紙，均有轉載。此民國元年十二月事，茲抄錄原文，以供治中國近代史者之參考。其文如下：

「民國初成，基礎未鞏，吾黨同志，方期和平進行，漸臻完謐。不謂政府因循坐誤，一事不舉。內無整理之可觀，外啓強鄰之輕侮，俄人首先發難，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上月廿一日，已與蒙古活佛締結條約。要領共分四項：第一，助蒙古編練軍隊，以扶植其自主。第二，蒙古領土上惟俄人獨享特別權利。第三，蒙古訂約惟俄之命是聽。第四，俄蒙自發生國交關係。夫以領土一部，而認爲交涉主體，是削我領土主權。以少數叛徒，而認爲政府，是違反國際公例。且約中所謂各部大臣，有所謂全權，有所謂蒙古主，名稱爲自治，實已形同國家。數百年一統之地，五大族生聚之區，安忍外人託維持之名，置之保護之下。禍胎所蘊，皆現政府之不識有以致之。庫倫獨立，起自去年，國內叛徒負固至一載之久，政府毫無辦法授俄人以可乘之機，罪一。俄人要求五條，不自今始，政府以延宕不答爲能，俄得藉口自由行動，罪二。六國借款，爲保全侵略兩派消長之機，政府不能利用，國本不定，啓

俄人侵略之野心，罪三。桂太郎至俄，薩柴諾夫至英，日俄英三國密謀，已喧傳世界，政府束手待斃，一籌莫展，罪四。巴爾幹戰雲方起，俄將有事於東歐政府不知察各國大勢離合操縱，以致坐失事機，成此危局，罪五。俄派郭索維慈至庫使叛徒自由交涉，罪六。上月廿日，路透電傳來，俄人承認外蒙獨立，外交當局，毫無感覺，麻木不仁，鑄此大錯，罪七。俄人要求橫暴至極，得之自我與得之於蒙，利害相去若天淵，政府並此不知，遑論防患機先？罪八。春夏之交，爲征蒙最宜之候，方針不定，蹉跎至今，戰事豈能倖免，棘手較前萬倍，罪九。外交均勢，一髮全身，俄人發難於先，列國繼起於後，一隅之地，牽動東亞全局，一旦實行瓜分，政府何以自贖？罪十。凡此十大罪，皆政府一誤再誤之明證，決非吾黨之詞。考其大因，尤其當局者，但知顧全權勢，不爲國家謀根本之解決。夫政策之行，政府應自有主觀，乃朝遭反對，夕即變更。凡己之位，稍有妨碍，雖犧牲政策在所不顧。一若國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吾黨以爲推此心理，非至亡國不止。用將政府罪狀，宣布天下，望全國國民急起直進，自負責任，逕行詰問政府誤國之罪，並決定全國大政，以一致之精神，爲對外之計劃，庶足以振民氣而救危亡。同人等更有進者，共和國之精神，以國民自強爲原則。蒙古若亡，內蒙滿藏隨之而去。我國雖大，能有多少豪古？能有多少滿藏？生死存亡，閭不容髮，惟我愛國同胞，急起圖之乎？」

先生初曾勸梁啟超勿與袁世凱合作，且袁氏野心經此打擊，不免難堪，除禁報流通外，同時多方注意先生之行動，梁啟超與張仲仁察其情勢，不能久留國內，乃勸先生間關赴德。民國二年一月首途，經莫斯科停留兩月，三月抵德，入柏林大學，仍攻政治學，以早稻田大學資格，聽講一年，即提博士論文。民國三年，歐戰起，先生對戰事發生興趣，每於壁上張一地圖，按戰情標記，以探討其勝負。房東夫人見而異之，竟疑爲日本間諜，某日因出語不慎，斷定德國將敗，更觸怒其愛國心，立電警察監視行動，而禁出入。先生以被困屋中，失去自由，乃主動要求查檢，以無證始告無事。是時留學生均有戒心，紛紛歸國，先生以機會難得，決心留歐觀戰。

民四年秋自德赴法、比、西戰場觀戰。十月抵英，聞袁世凱籌備帝制，事關國本，不遑坐視，乃在倫敦導報撰文攻擊，袁世凱知之，密囑使館注意，將禁錮之。嗣幸蔡松坡起義，西南獨立，先生得訊，倉卒返國。四月抵杭州，原意去西南，爲呂公望所留，任交涉署署長，參與浙江獨立事。年底辭退，任上海時事新報總編輯。

### 科學與玄學之論戰

民國五年冬，先生判斷德國必敗，主張對德宣戰，其時南北元老堅執已見，且信德國不可侮，先生奔走南北，往返陳說宣戰之利，最後對德絕交，終賴先生慧眼，得以確立。六年對德宣戰既定，乃主出兵爲當務之急，惜內政不定，各謀所私，對外問題難以一致。在歐戰結束時，我國所

謂參戰，僅以勞工充數而已。於和會席上應得之權利，無法爭取，此內爭之害，不謂不大。政府為檢討和戰，特設立國際政務評議會，段祺瑞為會長，先生任書記長。爾時，日隨梁啟超與各國駐華使節，作初步之接洽，所以為應付宣戰後之德國，有撤銷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及租界之消除，關稅由國人自主等。

段祺瑞馬廠誓師，反對復辟，先生實為主動最力之人。嘗由馬廠入京，分告各國使館以段祺瑞軍不日返京，萬不可承認宣統。事平後任總統府秘書。未數月，以北洋派元老不足有為，乃辭總統秘書轉而就北京大學教授。

徐世昌被舉為總統，聘為顧問，先生辭之。是時並與蔣百里發起組織松社，以紀念護國英雄蔡松坡先生。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歐戰結束，先生與梁啟超等結伴同行，重作歐遊。除夕首途，一月抵法京，觀巴黎和會，以私人資格對我國代表團貢獻策，為中國爭回不少權利。和會後，赴歐洲各戰場，考察戰後政治之新趨勢。

一九一八年與梁啟超同訪德國名哲學家倭伊鏗，相見甚歡。一九二〇年梁啟超返國，先生遂移居耶納，從倭伊鏗攻哲學，這是先生平生從社會科學轉研哲學的一個大關鍵。

講學社託聘聞名國內之哲學家，法國之柏格森與德國之倭伊鏗，兩人均以年老不便遠遊，乃由倭伊鏗介紹杜里舒先生自代。翌年（一九二一）歸國，隨同杜里舒至南京、漢口、北京、開封、濟南各地演講，先生親任翻譯及筆記。

是年（民國十年）先生與章太炎為上海國是會議起草憲法，著「國憲議」，日後國內談論憲法者，莫不以此為重要資料。

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先生在清華大學演講「人生觀」，引起科學與玄學之論戰。先生認為：

第一：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

第二：科學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

第三：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

第四：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為自由的。

第五：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的單一性。

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

丁在君（文江）讀之，不以為然。先之以舌戰，繼之為文相攻，於是人生觀之論戰起矣。參加這次論戰的人物有梁啟超、胡適、任叔永、孫伏圓、林宰平、張東蓀、章演存、朱經農、唐鉞、王星拱、吳稚暉、陳獨秀等；而論戰的主將則是張君勱與丁文江兩先生。

### 科學不是萬應靈丹

在一個落後而急望振興的中國，對「科學」這個名詞，就有了萬靈丹的應驗，當時正是一切以科學為尚和科學可以解決一切的時代，反張勱君

之論者，自然略佔上風；然時至今日，科學已達到一個極致，仍未能以科學來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則是事實，過去之爭論，以今人觀之又當別論。

現在引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施友忠於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日在紀念張君勱百齡冥誕學術研討會中的話可以做一證詞，他說：「今天我們是紀念君勱先生，所以論文大多與君勱先生有關。……最主要的焦點還是在一九二三年之後，我想說的是：丁文江、胡適之他們在講科學的時候，並沒有真正講科學的精神。『人生觀』裏面，根本就包括了科學方法等等。人對人生、對宇宙、對其他一切一切的態度，就是人生觀。這個態度有些是科學方法適用的，有些是科學所無法解決的。胡適之他們總把科學所不能解決的推到未來，說現在不能解決，將來必定能解決，這其實是對科學的迷信。相反地，君勱先生指出了科學的限度，這個精神還是應該保留並且向前推展的。」

立法委員胡秋原先生在這次研討會中也提到：「……張君勱先生當年提出的問題是：人生觀非科學所能解答。我並不贊成邏輯實證論，但是邏輯實證論有一個重點：人生觀是價值判斷，科學不能作價值判斷，邏輯也不能。所以人生觀不是科學所能解答。如果科玄論戰發生在今天，邏輯實證論被引入之後，那麼張君勱先生是勝利者，胡適之先生是失敗者。所以我們要瞭解，人生觀論戰科學派的勝利並不是真勝利，那是維多利亞文化在中國的勝利。今天說科學能解決人生觀，那是落伍思想。所以有時候一時的勝敗必須以

事後的長久來論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朋園教授更說得澈底：「……當年因為我們的國家很弱、很窮，所以胡適、丁文江要從科學一方面去提倡，所以他們是勝利者。這在當時當然是很迫切的需要。而張君勱先生所提倡的人生觀，應該在今天受到較大的重視。因為我們今天談現代化，現代化裡面就談到現代化所帶來的許多困擾，所謂種種污染；不是空氣的、河流的污染，而是我們心靈的污染。這一點，我覺得應該把張君勱先生的思想在今天發揚起來。如果我們只盡量地追求物質的享受，不約束我們自己，在物質享受方面有所檢討，那麼將來只有科學，沒有人生觀，人文社會科學沒有人重視，個人的心靈就都沒有修養。這在今天是一個很大的危機。站在實用的立場而不站在學術的立場，我覺得今天來紀念張君勱先生百年誕辰，我們應該重視他的人生觀。」

在這次學術研討會內，談人生觀問題只是極少的一部份，其他如君勱先生的民主憲法思想，德哲倭伊鏗對君勱先生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影響，君勱先生與民主社會主義的認知與實踐，以及當代新儒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並對一九五八年「文化宣言」提出了研討等等，均由學者專家提出論文，收穫甚豐。對張先生的認識，又進了一層。

### 由再生社到國社黨

民國十二年九月，先生在滬創辦「自治學院」，臨時院址設於愛文義路，第一次房金由史量

才付（上海申報負責人），另由張季直（謇）等捐二萬元，在吳淞購院址，院長一職由江蘇省長韓紫石聘先生擔任。

當時來往友人或任該院教職者有：梁啟超、范捷雲、劉開長、郭絳侯、黃任之、顧維鈞、王綏川、朱鳳千、蔣百里、陳彬和、蔣夢麟、王叔魯、羅鈞任、李蘭舟、陶孟和、馬寅初、劉廷芳、袁希濤、張東蓀、陳伯莊、史量才、范靜生、余左臨、沙武會、張仲仁、徐振飛、徐志摩、瞿菊農、袁觀瀾、沈信卿等皆一時碩彥。

自治學院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四日改為國立政治大學，由滬移吳淞新址，先生任校長。先生於每週一晨作唯物史觀之批評並講授英國政治，時張東蓀、羅文幹、金井非、瞿菊農、陳伯莊、張孟劬、陸鼎揆、吳國楨、劉英士、岑德彰、金國寶、葉元龍、潘光旦、德國翁剛夫人、英國李萊小姐、朱亦松、甘介侯、吳經熊等均曾先後任教；章太炎與蔣百里亦時至政大作學術演講。

民國十六年三月北伐軍佔上海，該校即為國民黨黨部所接收。目前臺北木柵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仍存有該校當年之藏書，性質互異，但先後同一校名，亦云巧矣。學校停辦後，自是深居簡出，致力於讀作，所譯拉斯基之「政治典範」，即是時之作品。

民國十七年在滬與青年黨人合創「新路雜誌」，凡署立齋名者，皆先生所作。翌年端午節前某晚，於途中為暴徒所劫持，被囚於滬警備司令部附近屋中，曾勒索鉅金，後悉先生身世乃釋放。暴徒曾告先生所為係受人所指示，意在使吃苦

頭，並略致歉意。被困廿日，難免生命之危險，但腿部於初劫時受有重傷，此後不良於行者久之。是年秋，中俄間為中東鐵路問題開戰，先生曾至滿州里綏芬河視察。俄人以爲要人，次日俄機轟炸綏芬車站，幸先一日離去。

民國十九年，先生四十五歲，去德國耶納大學教中國哲學。與德哲倭伊鏗合著「人生觀問題」一書。翌年返國，受燕京大學之聘，教黑格爾哲學。先是張東蓀、胡石青、湯佳心、王搏沙、徐君勉、羅文幹、陳博生諸先生，洽談籌組憲政黨，並將政綱黨章擬定初稿，以待先生返國決定。先生抵平後以憲政黨字樣太舊，不如改稱國家社會黨，衆皆贊同，於是正式發起組織中國國家社會黨，於民國廿一年四月十六日創立。

創黨之前，復有諸青來、陸鈺百、羅隆基、黃任之、胡子笏、萬武諸先生相率加入，並議先組「再生社」，發行月刊，於五月廿日創刊，以所主張懸諸國門，彙成公開的主張，再納入政綱。在創刊號「我們要說的話」一文中，揭櫫了九十八條綱領，除經濟部門由胡石青執筆外，餘皆以先生所提綱領而由張東蓀主稿。

再生出版後，駐平憲兵隊曾派員赴社中調查，認爲反動。時黃郛（膺白）任北平政治分會主任委員，先生與黃直接面談抗議，再生始未被封閉，人員亦未被逮捕。時承辦社中事務者有蔣勻田、楊毓滋、馮今白及王西清等四人，黨中人戲呼爲四大金剛。

### 組黨是賭性命的事

民國廿二年，先生在燕京大學教書，因「二八淞滬之戰」一篇演講，被迫辭職。移住石板房（即再生社），專心致力於組黨及著述工作。

及後至廣州中山大學講學，據先生文中述及「……未去之先，我再三向鄒魯校長聲明我的黨政活動及所辦之雜誌等，與其時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旨，絕不相容，鄒校長初頗殷勤，待之半年，即表示不願意，並說某方將有謀殺舉動云云，故請去職，因此離開中山……」。次年與張東蓀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後因兩廣獨立，中央軍到時，即遭封閉。

廿四年七月，中國國家社會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先生續被選為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大會發表宣言，主張立即抗日。時國社黨已擴張至長江珠江兩大流域。

民國廿六年，抗戰前夕，政府邀請全國各界領袖，集會廬山，商討國事。先生被邀參加，貢獻意見良多，會後赴平不久，七七抗戰即告爆發。民國廿七年四月十三日於漢口，先生代表中國國家社會黨致函中國國民黨正副總裁蔣介石、汪精衛，表示願共赴國難。蔣、汪旋即復函，願共相策勉。由是國社黨由秘密結社而公開活動，所謂兩黨「換文」，即指此事。

國民參政會在武漢成立，先生與所推薦之張東蓀、胡石青、羅隆基、梁實秋、陸鼎揆諸先生被聘為參政員。

「再生」於北平為日軍攻陷前，即移漢口出版，先生曾寫中國國家社會黨成立感想一文，其內容可為今日欲組黨人士之參考，其要點：

(一)談組黨不是兒戲事，是一件賭性命的事。  
(二)自年輕參加政治活動以來，即遭遇：(1)蘇俄之共產主義，(2)義德之法西斯主義，(3)英美法之民主主義，三種思潮路線。深信欲救中國，惟有國家社會主義。

(三)假定國內政治已上軌道，並不想從事活動。自民國十二年至廿五年，關於黨綱的草案，已有多次時改時修，並時與朋輩討論，至九一八事變，始公佈黨綱。

(四)號召黨員易，但能不結黨營私，是一難事。  
(五)青年是國家的寶貝，應視為國家傳代的公器，在其思想品行未成形時，不應以名利去勾引。

### 給毛澤東的公開信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先生致公開函給毛澤東，大意有三：

- (一)軍隊應屬於國家。
- (二)統一全國行政系統。
- (三)民族鬥爭，應以全體人民為主體，不應有階級成見。

民國廿九年，在雲南大理成立中國文化書院，先生任院長，其組織大綱及學規，要點有：

- (一)國中大學林立，所以採書院制之原因：(1)使大學畢業生，得從容從事於學問，而不必汲汲於衣食之謀。(2)師生相敬，使人才得以養成，而學統得以維繫。(3)在學問之外注意於修養省察，以為風氣轉移之關鍵。(4)一般大學僅重理智之造

詣，而書院則德智並重。

(二)研究工作：經子學——將各家之倫理觀念、法律觀念、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用科學方法，繼續發揚光大。史學——分別研究，編纂一部類似劍橋大學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之中國史。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根據本國環境中所生之問題，加以分析綜合而自解答之。哲學——瞭解西方哲學，並求吾國自身哲學之建立。

(三)發揮吾族立國之精神，採取西方學術之精神，樹立吾國學術之新精神新方向。教育學子，從事於學問深造與德性修養。先生於香港創辦「國家社會報」，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攻陷香港後停刊。(下期續完)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五〇八四二〇六。五〇六五三一

###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國外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臺幣壹仟伍佰伍拾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